张文先 总主编　　卢造钧 副总主编

庆阳通史

上卷

（远古至隋唐五代）

刘治立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1年·北京

《庆阳通史》编撰委员会

主　任　张智全

副主任　周　强　张文先

委　员　戴炳隆　李　银　董建镇　黄正军
张振强　卢造钧　闫庆生　黄正林
张诚基　郭晓霞　朱治晖　白自力
黎生明　黄国锋　王宪峻　王积聪
李　伟　杨静仁　李占年　潘正东
杜养惠

《庆阳通史》编写组

顾　　问　马西林　刘光华　李仲立

总 主 编　张文先

副总主编　卢造钧

主要撰稿人　黄正林　马　啸　刘治立　侯丕勋
李红雄　潘正东

编　　务　雷清刚　胡振宁　李浩滨

序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史学会会长
张海鹏

政协庆阳市委员会邀请庆阳市历史学会和有关专家学者共同撰写完成《庆阳通史》，勉我作序。我很高兴。庆阳旧时通称陇东。我对陇东地区知识甚少，何况陇东自古及今的通史。虽不能为，亦得勉力为之。一则庆阳地区位置重要，二则庆阳历史学会运作其中，虽欲辞而终未辞。

盛世修史，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涨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基本标志。历史活动有多久，记录历史活动的史书就有多久。于史有籍，于史有征，是中华民族傲于世人的看家本钱。现今国家承平60载，国内经济生产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发展，以人为本，歌舞升平，文化生活日趋繁荣。修史活跃，是新时期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历史所空前。

据我所知，国家有几项大的修史活动：一是推动全国撰修地方志书。第一轮规划志书基本完成，各省已出版约6000种。撰修志书，是记录历史活动的一种方式。第二是《中华大典》的编纂。国家组织专家学者把1911年前的历史文献，按照专题重新编纂。这也是记录历史活动的一种方式。第三是编纂大型清史。国家组织清史编纂委员会，动员清史专家通力合作，编修、编纂有清一代历史。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编纂清史是在清朝灭亡100年后对清代历史的总结。第四是在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及救灾活动开始后，国务院成立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委员会，动员全国力量，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史料。这又是一种记载历史活动的方式。以上四种是一类修史活动，即由国家组织的修史活动。第二类是各省组织的修史活动，近年各省编撰的通史纷纷出版，不完全统计，迄今出版各省（市）通史已达 23 种，还有数种正在编撰过程中。省以下的地区史编撰，也已提上日程。第三类是学术机构、高等院校组织学者进行的修史活动。这方面形成的历史学著作甚多，不胜枚举。也可以列出第四类，就是个人进行的修史活动。

就国家来说，省及省以下地区修史，都可以称之为区域史。中国地域广袤，每个地域都是组成祖国的分子之一。各省通史自然是区域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些省会城市组织编写的通史也在纷纷出版。这方面有：《武汉通史》、《广州通史》、《济南通史》、《南京通史》、《石家庄通史》等，这些都是大城市的历史。此外，还有一些中等城市的通史出版，如宁波、桂林、锦州、安阳等。这些也可以说是区域的中心城市。还有一类区域史著作如《呼伦贝尔通史》，呼伦贝尔地区地域庞大，以呼伦贝尔草原为特色，海拉尔是呼伦贝尔的首府。这部区域史不是以城市史为特色，这是我国区域史编纂中很有特色的一部。接下来就是《庆阳通史》的编撰。

庆阳位于我国西部，甘肃东部，农业发达，誉称“陇东粮仓”，现已成为新兴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庆阳通史》以今天庆阳市行政范围为限。由于历史上行政范围的变化，叙述历史上的庆阳市，不一定囿于今行政区划。以今天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特别是以东部发达地区的标准看，庆阳还是一个欠发达地区。但是，庆阳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显赫的地位。据《史记》记载，庆阳地区本是“戎狄之地”，自称华夏族的先祖不窋“奔戎狄之间”，开始了华夏族与戎狄诸族的最早的交往与融合。夏朝末，周之先人公刘自“戎狄之间”迁豳。豳之地望，学者认识不一，一说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一说在今甘肃宁县。旬邑、彬县、宁县三地今属两省，其实地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古人统称之为豳。宁县即在今庆阳境内，豳谓之陕甘之间更为妥帖。周先祖古公亶父迁居岐下后，庆阳地区长期是北

地诸民族控制的地方。戎狄、诸胡、匈奴、羌、鲜卑、党项、吐蕃、吐谷浑等部族以及汉族都曾在这里生息。秦统一中国，这里设置北地郡，建长城，修直道，庆阳地区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封建化进程。自秦汉至唐宋元明清，庆阳地区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典型地区之一。

庆阳地区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根据地之一。陕甘宁边区中的甘，指的就是庆阳地区。庆阳地区是甘肃省唯一的革命根据地。早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1927 年，共产党人王孝锡就在庆阳地区成立了中共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1931 年，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以前，这里诞生了甘肃省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4 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建立了西北第一个苏维埃南梁政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仅是第二次土地革命后期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还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庆阳地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庆阳通史》具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庆阳通史》由政协庆阳市委员会组织推动，通过庆阳市历史学会邀请国内对陕甘地区历史有专长的专业历史学者分工撰写，这就使这本通史具有可靠的学术基础。通史叙述了传说时代至 1949 年前的历史，不仅注意各历史时代的政治、军事，还非常注意各历史时代的民族问题，兼及各历史时代的经济、文化、社会（包括民俗），具有通史的框架结构，是通史笔法。

二、《庆阳通史》的撰写者充分利用现有史料和学术界研究成果。本书充分利用了庆阳地区的考古资料，采纳了庆阳地区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重要分布地区之一等观点；充分利用了庆阳地区历代地方志书和历史文献，也充分利用了已经出版的或者尚存档案馆的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史料，这就使得这本通史具有扎实的学术和史料支撑。

三、《庆阳通史》具有庆阳人的眼光。庆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该通史甚为关注。庆阳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地位很重要；庆阳是先周文化的发祥地；先周时期庆阳的农耕文化；黄帝传说与庆阳的关系；

秦直道、秦长城与庆阳的关系；义渠戎国在庆阳的建立以及秦汉及其以后长时期庆阳是居住在那里的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交汇地；民族迁徙与融合；庆阳的石窟文化；庆阳籍的历史人物王符、傅玄、李梦阳等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北宋时期长期在庆阳担任知州的范仲淹父子；庆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也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四、《庆阳通史》坚持了正确的撰写原则。《庆阳通史》明确提出站在“国家”历史的高度，突出庆阳“地方”的历史，这是很重要的撰写原则，通过历史文献和史料，叙述庆阳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把立足点站对了。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对庆阳地区的历史事件、庆阳历史的动态发展进行阐释，把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与庆阳历史相对接。确立这样的撰写原则，就不会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庆阳一隅，庆阳历史在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就活了。

庆阳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民族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温床和舞台，演出过重要的历史话剧。在清代，庆阳“淡出”中央王朝视野，区位优势由强变弱，正史中涉及庆阳的文献阙如。民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心移向西北，庆阳的区位优势复旺，地位复现其重要性。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成为发达地区，但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庆阳将再次显现它的重要性。由于庆阳地下矿藏丰富，人民勤劳，农牧并举，地理上位于陕、甘、宁之间，与西北三大城市西安、兰州、银川相密弥，庆阳在新世纪经济上的成长与腾飞，是可以预期的。

《庆阳通史》编撰事蒇，杀青在即，谨以此数语，赘于卷首，以为政协庆阳市委员会、庆阳市历史学会贺，为所有参与编撰工作的历史学者贺，为盛世修史贺，为庆阳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贺！

2011 年 1 月 22 日

序　二

兰州大学教授
《甘肃通史》主编
刘光华

我有幸被邀参加了《庆阳通史》编写中的几次会议，了解了编写的宗旨、指导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处理原则。在多次会议上，以张文先主席为首的庆阳市政协的领导、庆阳市历史学会的卢造钧会长以及几位执笔专家，根据工作进度适时提出很好的编撰与修改意见，形成评审纪要，对编写工作高度重视与负责，体现了他们对编好第一部《庆阳通史》的希望值很高、很有信心。

历经三年编写的《庆阳通史》终于定稿了。我认为，《庆阳通史》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具有鲜明的庆阳特色和较高的学术品位，是一部全面论述庆阳历史的好书。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就我的理解，《庆阳通史》有如下特点：

第一，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庆阳通史》共三卷，其中一卷是不到40年的民国历史，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民国史的叙述中，又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庆阳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历程，使读者了解了庆阳老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也是地方史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各卷都有对历史时期庆阳生态变迁及其影响的剖析，体现了该书的研究和撰述不是为了抒发悠悠思古之情，而是有着明确的为社会服务、为现实

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的责任意识。

第二，资料丰富。上起远古下迄民国，举凡庆阳的历史事件，不论涉及的是考古资料，还是正史记载、文献档案、报刊以及今人论著，包括外国考察家的珍贵记录，大体收罗无遗。如明清部分对旧地方志的利用是比较突出的，它依据旧地方志中的资料，对庆阳进士的数量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古代庆阳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并产生了可观的人才群体。民国时期国统区、陇东根据地的经济情况的叙述，也全凭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旧报纸。其资料的丰富程度，以往的论著是无法与之比拟的。

第三，图文并茂。《庆阳通史》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蓝本，结合本身的叙述，绘制了近三十幅地图，全面反映了庆阳历代的建制沿革，使读者对庆阳郡县的设置、变革情况一目了然。作为资料引用的几十幅图片，也是精心筛选的，对文字叙述起到了印证作用，增强了可信度和可读性。

第四，学术品位。地方通史的阅读对象，主要是本地区（包括邻近地区）的干部和历史爱好者，让他们了解庆阳的历史以及学术界对其中一些问题的争论，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对周祖在庆阳的活动及其经济类型、义渠戎国的经济生活、汉萧关及其以后的变迁、北地傅氏籍贯等问题，作者的认识是一方面，读者的判断是另一方面，由于介绍了有关争论的来龙去脉，并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资料，就会使读者参与其中，进而作出自己的判断，乃至根据资料线索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这对于提高当地干部与群众的素质，进而促进他们对庆阳历史的关心，很有必要。

下面谈谈我认为《庆阳通史》在学术上的几点突破，以就教于方家。

远古历史是历史编写中的难点。我感到作者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充分利用了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并能以简明的文字描述一般人不易弄懂的问题。这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易，作者在宣传科学的历史观方面作出了贡献。

历来被庆阳人引以为骄傲的，是周人农耕文明在庆阳的传播，但这个说法受到《庆阳通史》的修正。我认为我们在认识上有个误区，认为农业

文明比畜牧文明进步，所以很强调周人在庆阳传播农耕文明。但深究起来，与庆阳的历史实际似存在着矛盾。新石器时代，庆阳就存在着农业，年代在距今6000年—4000年间。周人是农耕族，最早的首领叫后稷，是夏朝政府的农官。后稷经若干代后传到不窋，史载“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年代大约在距今3700年—3600年之间（夏末）。既然庆阳在距今6000年—4000年间农业就已经发生、发展，所以不窋到庆阳这个“戎狄”畜牧地区后，最多只能说是恢复农业。其实一个农耕民族迁到戎狄畜牧区，由于经济类型的不同，被视为另类，所以到底是周人被戎狄畜牧化，还是戎狄被周人农耕化？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史载：古公亶父迁岐后，“乃贬戎狄之俗”，这说明不窋时族人是被戎狄化了。退一步说，如果周人迁到庆阳后仍从事农业，其规模肯定是小的，因为在众多戎狄包围中的周人，戎狄化是其主要趋势。所以周人农耕文明对庆阳的影响是被夸大了。《庆阳通史》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没有沿袭成说；而是经过对文献资料的缜密研究，提出了“不窋迁入庆阳，与当地戎狄杂处，接受了戎狄的生产方式，以畜牧和射猎为主，农业在生产结构中不占主导地位”，“周人在戎狄间，畜牧业有很大发展，始终未放弃农业”，这是一个很有创见的看法。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是庆阳在古代曾经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或者说是少数民族占主导的地区。庆阳与关中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同步发展起了原始农业。然而进入青铜时代后，庆阳与关中地区的经济却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关中地区沿着发展农业的方向继续前进；而庆阳及其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却走上了发展畜牧业的道路，其居民则成了戎狄，包括庆阳在内的西北地区，则成了戎狄生活畜牧区。这是为什么？

《庆阳通史》的作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引述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原来距今4000年前后的齐家文化中期，庆阳及其以西、以北的西北地区遭遇了一次新的冰期，由于新冰期气候及其作用，这里的气温变冷，降低了3—4℃，致使庄稼只长杆子而不结穗子。因而在气候适宜期发展起来的农业经济，遭到了彻底破坏。农业经济的解体，使定居在河谷

地带的大量人口被迫分散迁徙到更广阔的空间范围中，从事简单的畜牧生产活动；其社会发展也因此处于停滞状态，虽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贫富分化，却又保留了大量氏族制的东西。这种畜牧生产和氏族制度的保留，就是西北地区戎狄族社会的特色。所以，不窋带领族人所投奔的是“戎狄之间”。这里的“戎狄”，是与“华夏”对举的一个词，例如华夏族居中原，而戎狄族居华夏族之周边；更重要的，则是华夏族与戎狄族在服饰、语言、信仰和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说，华夏族在经济、文化上比戎狄族先进。在社会制度上，华夏族进入了文明时代，而戎狄族却停留在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中；经济上华夏族从事定居农业，而戎狄族从事的则是畜牧射猎经济。不窋率族人迁到“戎狄之间”，就意味着他们要适应戎狄族居住区的环境，要暂时放弃原来的定居农业生活，从事畜牧射猎经济。只有适应了新环境并站住脚跟之后，才能经营自己原来的定居农业。文献记载，到不窋的孙子公刘时，又带领族人，向南迁往豳地，“务耕种，行地宜”，“复修后稷之业”，重新经营农业。周人迁居庆阳的时间不长，又是与戎狄共处，在戎狄化过程中并未改变庆阳的民族构成和经济类型。所以，从不窋“奔戎狄之间”到公刘迁豳、古公亶父迁岐以前，庆阳一直是戎狄生活区。西周时，陇东居住的是太原戎；春秋战国时是义渠戎。秦汉一度开发北地郡，徙内郡汉人于北地，庆阳成了民族杂居区，有汉族、义渠、匈奴、羌族等。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由于汉末郡县的撤销，少数民族又控制了庆阳的广大地区。……所以可以说，庆阳在古代大多数时期，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

与多民族构成相适应，历史上庆阳的社会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主，或者是半农半牧的。到了近古，庆阳南部地区虽成了农业区，而北部地区则仍为半农半牧。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在军事上，庆阳对中原王朝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中原王朝建都关中期间，整个陇东“南卫三辅，北御羌戎”。当西北发生战乱时，“控扼之备，未曾不在庆州”，“庆州为关中屏蔽”。除了地理方面的优势外，这里还给中原王朝提供军事人才和战马。《庆阳通史》对各代庆阳籍的将领有所介绍，而无名氏的“六郡良家子”，肯

定多不胜数。至于战马，“秦始皇帝令（乌氏）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就是因为他“畜至用谷量马牛”，对统一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秦汉在陇东设牧师苑，畜养马匹；唐肃宗在陇东“搜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直到明中叶巡抚陕西和总制三边的杨一清，仍在陇山东西为畜养军马之事规划操劳，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上述所写虽是挂一漏万的，但意在说明我对《庆阳通史》的推崇。当然它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北地傅氏籍贯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有人提出临泾不临近泾河，对传统的汉临泾、安定县的治地提出了质疑，对此也没有引起重视，这些都是庆阳的学者今后应当注意的。

2011 年春

绪　论

张文先

庆阳市位于甘肃省的东部，关中平原的西北部，在各个历史时期，庆阳一直发挥着拱卫中原王朝的作用。周秦汉唐时期，关中为中国政治中心，庆阳的地位十分重要，史称“南卫关辅，北御羌戎，……其地山川险阻，风俗劲勇。……岭塞高邛，下临三辅，有建瓴之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有“每西北发难，控扼之备，未尝不在庆州”之说。[①] 即使在中国政治中心移出关中后，庆阳依然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北宋时期，赵宋王朝与西夏对峙于庆阳一线；明朝时期，庆阳为抗击鞑靼进犯关中的前哨。因此，中国古代历史上，庆阳对中原王朝起着屏障作用，正所谓“三秦为海内上游，延安、庆阳为关中藩屏”。[②]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庆阳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王孝锡建立了中共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建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既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庆阳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不论是从国家史还是地方史的角度，庆阳历史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对庆阳历史的研究，不论从存史、资政、教化、育人与庆阳文化积淀的角度，还是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7《庆阳府》。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原群盗》卷75，中华书局1977年版。

从推动庆阳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内容

本书以庆阳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时段的取舍上，上起庆阳史前有人类活动之始，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 20 万年，下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既符合一般通史的写作体例与规范，又适合庆阳历史研究的现实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庆阳历史，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行研究与撰写。自庆阳历史上有建置以来，不同朝代在庆阳境内设立的行政机构不一，管理范围不一，变化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书选取现在庆阳市所辖区域为研究范围，同时，也不完全拘泥于这样一个范围。历史上，庆阳与周边地区不论在行政建置上，还是在经济社会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这样，许多事件的研究都“超越”了当今庆阳的界线，这是难以避免的。作为一部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通史，我们站在国家历史的高度，突出地方历史，主要彰显了以下内容：

——突出地方文化的研究。地方史最显著、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地方为核心进行历史研究与阐述，因此，古代庆阳在文学、哲学、史学、石窟艺术等方面的文化成就成为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故重点论述了王符的哲学思想、傅玄的政治思想、李梦阳的文学成就以及佛教与石窟艺术。还论述了庆阳籍士人与将士在朝廷、在外地的政治、文化、军事活动，如汉匈战争中的北地籍将士，庆阳大族与魏晋南北朝政治，王饶与五代政治，宋金战争中的庆阳籍将领，明、清庆阳士人群体的从政风格与个性特征等，这些人物的事迹并不都发生在庆阳，但我们认为这是庆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所作所为彰显了庆阳文化在全国的影响与地位。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本书以鲜明的地域认同予以呈现，如先周历史与文化，有陕西旬邑、彬县说，有甘肃宁县说，有山西说。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明确采取甘肃宁县说。在论述中，通过对传世文献、考古材料的分析，对接了先周文化与庆阳文化的渊源关系，但本书并不否认其他诸说的存在。对

其他能够彰显地方个性与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在不失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本书也作了重点研究。

——突出地方社会经济的研究。历史上庆阳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达到了什么水平，这是庆阳籍人士及关注庆阳建设的同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在研究中，尽管感惜于唐宋之前反映古代经济发展脉络的文献十分缺乏，但我们还是根据其他资料尽力反映出庆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注意每个时段庆阳经济发展的状况。明清以来，地域社会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由于充足的方志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史料链，故成为本书研究的重点，较多论述了明清时期庆阳的移民与屯田、赋税、畜牧业、手工业、农村市场、交通、灾荒与救济、生态变迁等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经济也出现缓慢的变化，除了传统经济有所发展外，还出现一些现代化因素，如半机器工业、商会的建立、农业贷款、现代公路交通与邮电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反映民国时期庆阳的现代化水平。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中共在庆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成为庆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本书研究的重点内容。

——突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周秦汉唐以至北宋和明朝，庆阳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或近边地区，这里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从先周开始，有戎狄、匈奴、羌胡、鲜卑、突厥、吐蕃、党项、鞑靼等族，有的迁徙到庆阳长期居住，有的从事掠夺与战争。在中原王朝处理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的活动中，庆阳扮演了重要的区域角色，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因此，少数民族及其与中原王朝在庆阳的对峙与和解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周部族先祖迁徙庆阳以及南迁建立豳国，义渠戎的兴起及建立政权，秦长城及秦直道的修建及历史地位，东汉羌人在庆阳的起义，北宋与西夏政权在庆阳的对峙，明朝防御鞑靼的斗争，同治陕甘回民事变及其对庆阳的影响等，都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反映了庆阳在历代王朝兴替、中原与少数民族关系中的突出历史地位。

——突出民国史和中共历史的研究。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庆

阳存在国民党和中共两个政权。在以往的研究中，庆阳国民党统治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为了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重点突出了民国时期庆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研究。如北洋政府时期庆阳的民变、地方自治、人口与自然灾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庆阳社会、陈珪璋的崛起与覆灭、保甲制度与地方武装以及社会经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庆阳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社会等。中共在庆阳的政权建设研究中以往较多关注重大政治事件，在通史论述中，不仅研究了重大政治事件与战役，如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边根据地、红军西征及山城堡战役、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建设、解放战争时期的陇东战役等问题，还系统研究了从土地革命到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庆阳根据地的经济。

除此之外，发生在庆阳周边的历史事件对庆阳产生的影响或涉及庆阳的历史问题，我们也在不同层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目的是为了反映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和作为地方历史的系统性。把庆阳作为中国历史或西北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这不仅使本书站在了应有的高度，而且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使本书更加丰满和完善。

二、学术史回顾

在研究和保存地方史料方面，庆阳具有光荣的传统。早在唐朝时期，曾撰有《庆州图经》；北宋仁宗时期宁州知州杨及曾撰修成《五代史》，另有人撰写了《庆州志》；明清时期庆阳至少有 7 部府志和近 19 部县志问世，存世者如明朝嘉靖《庆阳府志》，清朝顺治《庆阳府志》、乾隆《庆阳府志》。另有乾隆《合水县志》、《环县志》、《正宁县志》，康熙《镇原县志》、《宁州志》，嘉庆《镇原县志》，道光《镇原县志》，光绪《镇原乡土志》。民国时镇原人慕寿祺撰多卷本《甘宁青史略》，成为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文献；先后有《重修镇原县志》、《重修宁县志》、《庆阳县志》、《民国正宁县志》等方志问世。除了志书以外，地方士人与官员还记录了发生在庆阳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调查，如惠登甲的《庆防记略》、胡庭奎的《续庆防记略》和罗人骥的

《庆阳各县社会调查》堪称其中的代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庆阳历史资料编辑、整理与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新修地方志不断问世。如卢造钧主编的《庆阳地区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是一部卷帙浩繁、全面反映庆阳历史的大型地方志书，全书有 53 个分志，930 余万字，涉及内容十分丰富，是有史以来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庆阳地方志。同时，各县地方志也相继问世，其中，庆阳县编辑出版 1984 年本（铅印 700 余册）和 1993 年本（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县志，若加上 1962 年由陆为公、杨景修等整理的县志（出油印本 60 余部），共有 3 种版本存世；另外还有《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环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正宁县志》（1986 年）、《镇原县志》（1987 年印行）、《合水县志》（1988 年印行）、《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合水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这期间，还出版了一些专志，如《庆阳地区交通志》、《庆阳地区供销合作社志》、《庆阳地区金融志》、《庆阳地区戏曲志》、《庆阳地区军事志》、《庆阳烟草志》、《环县军事志》、《环县土地志》、《环县道情皮影志》、《长庆油田志》等。这些方志和专志的出版，为研究庆阳历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二是古代方志与文献整理成就巨大。在新的方志撰写过程中，开始了对古代方志和文献的整理。1979 年，华池县志编写组整理印行乾隆赵本植《庆阳府志》手抄影印本，嗣后，乾隆《正宁县志》、民国焦国理、慕寿祺《重修镇原县志》、乾隆陶奕曾《合水县志》、民国张精义《庆阳县志》、乾隆高观鲤《环县志》、道光《镇原县志》相继点校出版或得以影印发行。其中，庆阳地区志编委会点校嘉靖、顺治《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并合编出版，这两部府志的点校出版，对深化明清庆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地方重要历史文化名人著述的校释与整理，也取得进展。王符《潜夫论》的整理著作最多，有王继培、彭铎《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王宁《评析白话本潜夫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张觉《潜夫论校注》（岳麓书社2008年版），胡大浚、李仲立、李德奇《〈王符潜夫论〉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傅玄《傅子》的校注本有蹇长春等《傅玄、阴铿诗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高新民、朱允《傅玄傅子校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刘治立《〈傅子〉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李梦阳的作品也出现了选注本，如张兵、冉耀斌《李梦阳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惠登甲《庆防纪略》，也有多种校点本出版。这对地方史与地方文化的研究，起了重要推进作用。

三是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成绩斐然。庆阳是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革命文献，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历来十分重视革命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新时期以来，除在地方志编撰中辑录和保存了大量革命史料以外，地、县党史办专门组织选录、整理了大量各个时期的革命文献专集。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的“庆阳老区革命文献丛书”，有《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下）、《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陕甘宁边区陇东民族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下）、《陇东根据地党的统战工作》、《陇东根据地的群众运动》、《陇东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陇东民主政权建设》、《陇东党的统战工作》、《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陇东革命历史人物选》等。出版了高文等编《陇东革命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含殿主编《华池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南梁曙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庆阳地区党史办的《陇原星火》（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郭文奎主编《南梁烽火与中国革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党史办的《红军西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另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涉及庆阳历史的革命回忆录和传记，如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张才千的《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白黎的《刘志丹传》（解